

道教史

许地山 著 詹石窗 讲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道教史

许地山 著 詹石窗 讲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道教史 / 许地山著 ; 詹石窗讲评.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506-0031-7

I. ①道… II. ①许… ②詹… III. ①道教史—中国
IV. ①B9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9347号

- 书 名 道教史
著 者 许地山 著 詹石窗 讲评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无锡市扬名高新技术产业园 B 区 75 号 邮编:214024
开 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7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031-7
定 价 21.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0—85435666)

许地山《道教史》通说

詹石窗

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自商务印书馆于 1934 年出版以来,至今已有七十余年。在这 70 多年中,由于社会需求的增长,我国出版界曾经先后重印或重版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例如上海书店 1991 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年版等。这些不同的版本促进了许地山先生《道教史》的传播,也推动了学术界的道教文化研究。海内外又先后出版了许多同名或者同类型的著作,尤其是最近的二十多年来,学术界对于道教史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但不论情况如何,许地山先生在该领域的开创之功依然为学者们所称道。

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关注,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形成的特殊背景、研究视角和丰富内涵密切相关的。

一、许地山《道教史》的形成背景与条件

由于在中国学术界开创了“道教史”的学科研究领域,许地山先生成为我国该领域的先驱,他的《道教史》著作向来颇受瞩目,后来的研究者将之作为必读书目,认真查考,从中获得启迪、智慧。然而,许地山先生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道教史》的?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我国道教史研究的先驱?

众所周知,1919年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国,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与“赛先生”,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探索强国之路。这场运动导致了中国社会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从形式上看,“五四运动”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除了波及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制度之外,更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转折点。在反帝、反封建和倡导科学、民主的精神激励下,大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他们广泛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并且将西方文化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文化遗产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传承造成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以西方文化为借鉴的各种学科逐步建立起来。许地山先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并且积极投身于新文化建设之中。

许地山(1893~1941),名赞堃,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湾台南一个爱国志士的家庭,回大陆后落籍福建龙溪。1910年,许地山先生中学毕业后曾执教于漳州第二师范学校;1913年,许地山先生奔赴缅甸,任教于仰光中学。1916年,许地山先生回国,于次年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时过2年,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即在他所在的燕京大学点燃。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许地山先生不仅深受“五四运动”的精神熏陶,而且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1920年,许地山先生于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期间,许地山先生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人联合主办《新社会》旬刊,积极宣传革命。1921年1月,他和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12人,在北平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小说月报》。由此可见,许地山先生的学术活动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五四运动”的烙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地山先生与沈雁冰等人在学术上走的却是不完全相同的路子。虽然,他一直对文学情有独钟,并且创作了《落花生》等脍炙



人口的作品,但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尤其是对包括道教在内的宗教文化颇为关注。他在燕京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之后,又进入该校的宗教学院,继续攻读宗教学理论,并且获得神学学位。1923年,许地山先生赴美国,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研究宗教史和宗教比较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此后,许地山先生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学理论等。1927年,许地山先生回国,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和宗教学院任副教授、教授。他狠下苦功,潜心钻研印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掌握了梵文、希腊文和中国古代的金文、甲骨文等,这为他后来研究道教,进而撰写《道教史》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基础与文字基础。

许地山先生早年留学欧美的特殊经历以及后来专职从事宗教学研究 with 教学的生涯,使得他有可能了解当时世界上有关道教研究的最新动态。在中国“打倒孔家店”口号下以极为迅猛之势冲刷传统文化的前后,西方许多国家的一批学者却悄悄地进行汉学研究。其中,道教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像法国刘应在《中国哲学家们的宗教史》中说到“中国共有三种道士”等等情况;著名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在他的《哲学词典》中设立“中国的教理问答”一章,以“老君的宗派”来指称“道教”;叙利亚语教授德金(Joseph de Guignes)在他的《匈奴、土耳其、蒙古和其他鞑靼诸国通史》中,使用了“道士”的专称,并且称中国唐代“老子是中国的一神格”;此后的沙畹(Chavannes)发表《中国的社神》、《投龙简》等专论,对中国民间宗教与道教的典礼仪式予以述评;沙畹的弟子伯希和(Pelliot)、葛兰言(Granet)、马伯乐(Henri Maspero)都在这方面下了工夫,尤其是马伯乐(Henri Maspero),撰写了《道教的神仙——就其如何与神交感而言》、《中国六朝时期的人的宗教信仰和道教》以及《古道教及其养生术》等一系列论文,戴密微(Demieville)曾将马伯乐遗稿整理成《关于中国宗教和历史的遗稿》,其中第二卷的名称就叫做《道教》。除了法国学者之外,德国、比利时、荷兰、日本、美国等海外学者也在道学研究方面付出极大努



力。他们一方面翻译《道德经》、《太上感应篇》等一系列道家与道教经典,另一方面则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开展调查,分门别类地考察道家与道教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养生理论与方法。如日本的小柳司气太撰写的《道教概说》^①以及《白云观志》^②、英国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所著的《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和社会改革家》、翟林奈(Lionel Giles)的《中国神秘主义的沉思录——庄子哲学选》(*Musings of Chinese Mystic-selections from the Philosophy of Chuang Tzu*)、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著的《道及其力量——老聃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The Way and its Power: Lao-Tan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等等。^③ 这些论著在许地山先生留学前后陆续问世,作为精通多国文字的许地山先生是有可能查阅到的。退一步说,即使许地山先生无法查阅当时国际上道教研究的全部成果,也势必可以比较充分地感受到西方学者重视道教研究的学术氛围。故而,许地山先生虽然也和许多“五四运动”健将一样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但他并不像某些文化激进主义者那样全盘否认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以审视者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有所批判,也有所继承。他对道教的态度也是如此,这是他在同时代学者中能够以比较中肯的笔调撰写《道教史》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许地山《道教史》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实际上只有半部,所以有的出版社印行这部著作时便标明是“上编”。

该书开头有个弁言,简要陈述了内容构成,紧接着是“绪说”,然后是关于

① 按,小柳司气太的《道教概说》的中译本于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小柳司气太的《白云观志》于日本昭和九年(1934)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

③ 参见陈耀庭《道教在海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道教前史”的论述。顾名思义,这里所谓“前史”也就是关于道教以前的历史。具体来讲,即关于道教文化渊源方面的历史考察。该书从七个方面展开讨论,其中包括:“道”的意义、道家思想的建立者老子、老子之后的道家、道家的最初派别、秦汉的道家、神仙信仰与追求、巫觋道与杂术。

就内容来看,该书有如下三大特点:

第一,善于引经据典,对道教史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辨析。例如在《绪说》里,作者一开始就提出了思想方面的“道”与宗教方面的“道”,指出道家之“道”属于思想方面的“道”,而道教之“道”则属于宗教方面的“道”。这样的区分显然有助于读者了解道家与道教的区别,在追溯其文化渊源的时候不至于将两者混为一谈。至今为止,学术界依然沿用这样的区分,即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归于思想流派,而把以老子为教主的道教归属于宗教。

为了深化概念内涵的认识,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引述了梁代刘勰《灭惑论》卷八的文字,以为历史上的道家与道教可以分为三品:即上标老子者为上品道,次述神仙者为中品道,下袭张陵者为下品道。按照刘勰的看法,老子是“大贤”,他所著的《老子》是“导俗之良书”,而神仙之道与老子之道相比不过是“小道”而已,至于张陵则被刘勰骂为“米贼”。对于刘勰的看法,许地山先生部分赞同,部分反对。一方面,许地山先生指出上、中、下三品的划分,得道家与道教分别的梗概;另一方面,许地山先生又指出,就实际说来,三品没有截然的分别,其理由是张陵祖述老子,以《老子》为最上的经典,可见彼此关联密切,不能一刀子切开。这样的分析,显然是有文献依据的。由此可以看出,许地山先生的立论是经过文献考证和认真思考的。

在讨论道家与道教的划分问题时,许地山先生既引述了刘勰、释道安等教外人士的看法,也注意到道教文献中的看法,他在考察了上、中、下三品的说法以及马端临关于清静说、炼养说、服食说及经典科教说之后,又引述了张君房《云笈七籤》关于正真教、反俗教、训世教的说法。尽管许地山并不完全



同意张君房的意见,但将各种不同划分方式都罗列出来,无论如何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上关于道家与道教的认知。

许地山重视经典稽考以辨析概念,这在《绪说》以后的各章中也依然得到贯彻。例如第一章论述“道”的意义,先后引述了《周易·系辞》、《礼记·礼运》、《老子》、《尚书》等文献,指出了不同经典中关于“道”的不同内涵。由于查阅了诸多文献史料,许地山得以梳理“道”的意义的发展变迁,指出了春秋之后“道”字所附载的玄学意味。再如第五章关于“阴阳”与“五行”概念的由来与内涵的问题,许地山先生也进行了很充分的引证。他指出,“阴阳”概念最早见于《老子》,其后的《周易·系辞》、《荀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延续使用。他通过查考发现,越迟的文献使用“阴阳”概念的频率越高,这显然是仔细阅读文献之后所得出的可靠结论。

第二,善于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概括。许地山先生在《道教史》的《弁言》中称:“此本不能说是著作,只将前人及时人研究底结果总撮起来,做为大学参考底书。”表示这部书不能算是“著作”,这是许地山先生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说明他对什么是“著作”有严格的标准;不过,这种谦虚的表述并不影响后人对这部专书的性质认定。当代的研究者不仅将之划入了名副其实的著作行列,而且奉为道教史研究的开山代表。至于说“将前人及时人研究底结果总撮起来”,这恰好体现了许地山先生善于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予以综合,从而形成比较系统的道教前史论述。

业内人士不会忘记,在20世纪早期,随着国门的打开,许多外国学者,包括基督教的传教士,纷纷到中国考察,他们根据自己所能够见到的资料,撰写各种介绍与讨论中华文化研究的文章和著作,其中道家与道教研究的内容也占有一定的分量。国外学者的道家、道教研究论著不仅受到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关注,而且激起了国内学者这方面的兴趣,他们也先后撰写了该领域研究的许多论著。例如刘师培先生于1911年发表的《读道藏记》,刘咸炘先生于



1924年发表的《道教征略》，陈寅恪于1933年发表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等，这些论著对许地山先生撰写《道教史》的工作来说，无疑是颇有助益的。从其《道教史》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到许地山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高度重视。例如该书第二章考察道家思想的建立者老子时，分出许多小标题予以论述，每个小标题中的内容，几乎都先回顾前人研究状况，引述已有看法，然后再作佐证或分析。该章一开始，许地山提出了“老子是谁”的问题，然后引证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先生以及本国学者冯友兰先生等学者的看法。津田左右吉先生以为老子是“乌有先生一流底人物”，而冯友兰先生则以为老子是历史人物。对于这两派意见，许地山先生都通过经典文献的对照，进行辨析。从种种引证可以看出，许地山先生不主张老子为乌有，而认为是历史人物。与此同时，许地山先生对老子与老聃、老子与老莱子等关系问题也多有论述，表现出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在讨论了老子其人之后，许地山的《道教史》又讨论了《老子》的由来及其思想内容。正如在追溯老子其人的生平时一样，许地山先生对于《老子》的作者以及问世时代问题，也充分注意到前人的已有成果，他古今结合，旁征博引，广泛涉猎了儒、道、法等不同学派的文献记载，从先秦诸子的论述推断《道德经》的产生时代，对《老子》的思想，尤其是其道论、人生论进行概要性的阐述。由于许地山先生重视前人研究成果，并且将其分析与经典内涵的解说结合起来，这就使得整个分析具有一种厚实感。

第三，善于在历史框架中进行追溯和比较，以彰显道教渊源的不同侧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的思想渊源是多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成分是如何被道教所吸纳并且转变为道教的内涵，这本身就是历史。因此，以历史的眼光审视道教思想渊源，展示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成分与道教的关系，这是道教史论述的关键之一。

为了比较完整地展现道教的思想文化渊源，许地山先生建立了一个具有



广泛包容性的历史叙述框架。从其篇章结构可以看出,许地山所谓“道教前史”是有侧重点的,这个侧重点就是道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变迁。全书于《绪说》之外,分列七章,有关“道”的意义解读以及道家的历史就占了五章,这说明许地山先生是特别关注道家文化的。按照历史的面貌,许地山建立了自己的叙述结构,形成了谋篇布局的独特体式。在阐述了“道”的意义以及老子与《老子》思想内涵之后,许地山先生即把眼光放在关尹子、杨朱、列子的稽考上,并且以第三章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其标题《老子以后底道家》中的“以后”两个字看起来虽然很平常,但恰恰是这两个最为平常的字眼体现了许地山先生对道家发展脉络的历史把握,因为“以后”既表示一种新的起点,也表示一种顺序,关尹子、杨朱、列子的排列本身就是按照先后顺序进行的,有顺序排列就有历史,有历史就有继承和变化。许地山先生很重视这种继承与变化内涵的追溯,而这种追溯本身又是在比较中进行的。例如在考察关尹子的时候,许地山先生将《庄子》评述关尹子的言论与《老子》的言辞相比较,以展现老子与关尹子在思想上的共同点及不同点;在考察杨朱的时候,许地山先生通过《列子》、《荀子》、《吕氏春秋》、《孟子》、《庄子》等诸多文献的查证和比较,说明前人实际上把杨朱列入老子、关尹子一流;在此基础上,许地山先生通过征引《列子》中的《杨朱》、《力命》等篇章,凸显了杨朱以欢乐主义为特色的重生思想。与杨朱的稽考方式大体类似,许地山先生也是将列子置于道家发展的历史链条中来评估的。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道家之部有《列子》八卷。对于这部著作是否为列御寇所作的问题,前人有不同看法。许地山先生一方面通过《列子》与《易纬·乾凿度》的用语比较,推测现存《列子》一书可能不是列御寇所作的原书,另一方面又通过“太易”、“太初”等专有术语的追踪,以展示《列子》的道家本色。如此环环相扣,本来属于个别人物的分析便构成了相对完整的道家历史论述模块。

在考察了关尹子、杨朱、列子之后,许地山先生放开了视野,他以承上启



下的方式,分别阐述先秦道家的派别与秦汉时期的道家典籍、主要思想。关于先秦道家的派别问题,许地山先生将彭蒙、田骈、慎到归入静虚派,将托名管子的一些论述归入法治派,将托名姜太公的部分论述归入阴谋派,将庄子及其后学归入全性派。在这个专题里,许地山先生把论述的重心放在庄子学派上,他分别稽考了庄子及《庄子》的文献问题、庄子的思想、庄子门人的思想等,然后以《庄子》外篇为基本线索,阐述承传稷下法治派的庄子学、承传稷下阴谋派的庄子学、秦汉儒家化的庄子学、承传杨朱派的庄子学,整个阐述既兼顾整体,又突出重点,其思维脉络甚是明晰。关于秦汉道家的问题,许地山先生主要阐发《吕氏春秋》的养生说、《淮南子》及阴阳五行说。尤其是阴阳五行的问题,许地山先生作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他一方面分别考察了“阴阳”与“五行”学说的缘起,另一方面则追溯了阴阳五行会通的历史脉络、阴阳五行与“气”、“魂魄”等概念的关系,展示了该学说的丰富内涵。

道教的思想渊源是多元的。除了道家之外,还有许多因素相继被吸纳。例如神仙思想、巫觋道与杂术等等。这些内容,许地山的《道教史》虽然没有用大量的篇幅予以论述,但也显得颇为充实。从逻辑上看,神仙思想以及巫觋道和杂术,在该书的框架体系中是与道家思想处于并列关系的,但作者在具体考察分析中又遵循了纵向的历史原则。与其他大部分章节不同的是,作为重点考述神仙思想的第六章没有再细分节目,作者一气呵成,以《山海经》、《离骚》等先秦文献为切入点,以《汉书·地理志》为压轴,从远古的养生实践说起,层层推进,直到西汉的求仙活动,呈现给读者一种斑斓多姿的画面。至于巫觋道与杂术的考析,该书则又回到了分节分目的叙述结构上来,作者考察尸与巫的关系、巫的职能、秦汉的巫祠以及巫事鬼神所采用的诸多杂术等,这些内容对后来道教的斋醮仪式和法术具有很大的影响,有些甚至以原始的样态依然保存在道教之中。故而,许地山先生的稽考和描述得以让读者比较深入地了解道教诞生的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源头。

三、许地山《道教史》的学术贡献

许地山先生英年早逝,但他却因为给后人留下了《道教史》这样的重要学术论著而时被称道。当今的道教研究者,几乎没有人不读他的这本书。

就中国道教研究的角度来看,许地山《道教史》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道教史”的学科概念。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是以海内外研究成果为基础的,他的这部著作吸纳和综合了前人在该领域的许多见解。不过,在许地山之前尽管有关于道家与道教研究的许多论文和著作,但却没有直接以“道教史”为名的学术专著。许地山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不仅撰写了历史上第一部《道教史》著作,而且提出了宗教学领域的一个学科概念。从学科划分来看,宗教学乃是与哲学、文学、史学等处于同一等级的一级学科概念,在该一级学科之下,尚有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民间宗教等不同的分支学科。每个分支学科都可以有相应的史学,道教史即是道教学分支的史学学科。怎样阐述道教的形成与变迁的历史,有没有学科意识,其结果自然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学科意识,就可能把道教史写成神话或者杂感;反之,有了学科意识,就不但要考虑其系统性,而且必须以经典文献以及田野考察的诸多资料为依据,来佐证其观点。统观全书,我们可以肯定,许地山先生是从学科的角度来建构其《道教史》论述的。他不是在向人们叙说道教神话,而是力图以大量的引证来阐述道教的形成与发展。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道教史》尽管只是论述“道家及预备道教底种种法术”的书,但其基本内容却已经贯穿着建立学科的精神。因为作者不是零碎地讲述某些现象,而是针对道家与道教的文化内涵,按照历史的自然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论证,这与我国清代以前传统的道经注疏以及《史



记》开创的历史叙述样式很不相同,已经具有专门史体系的特质,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之看作一个新学科的建立。在这里,我们的表述之所以用“学科”这个概念,而不用“科学”,是因为“道教史”从总体上看属于人文的领域,它的建立尽管也受到了西方科学方法论的影响,但毕竟与近代的实验科学理论有根本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恰恰是它的优势所在。由于特殊经历,许地山先生既了解西方自然科学的路数,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因此,他能够根据收集到的道家与道教史料,最终撰成富有学科意义的《道教史》。

在许地山《道教史》之后,陆续出现了许多名称相同或相近的著作,例如傅勤家先生的《道教史概说》,日本学者窪德忠先生的《道教史》,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两卷本《中国道教史》,卿希泰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道教史》等等,这些关于“道教史”的论著虽然在内容上逐步详尽起来,篇幅也大大增加,但就道教渊源的探讨而言,却基本上沿袭了许地山先生所建构的框架。后人可以超越许地山先生这部《道教史》著作,却无法绕过它。作为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学者,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至今常常被学界所引证,这说明该书仍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影响。

第二,第一次建立了多角度论说道教前史的逻辑体系。按照许地山先生自己的说法,目前我们所见到的《道教史》实际上是道教前史,尽管不是对道教历史的完整论述,但却在特定领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开拓。许地山先生不是孤立地看问题,而是从许多不同角度展开的。

首先,许地山先生特别关注作为道教前史的文献学考察与分析。例如对于《老子》与老子的关系问题,许地山先生先是查考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之后又根据《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以及《淮南子》等汉代典籍的征引,来推测老子《道德经》的原貌。根据自己的第一手查考,许地山先生发现,从《韩非子》到《韩诗外传》、《史记·货殖列传》等许多先秦到汉代



的古籍所征引的《老子》文辞与通行本老子相差甚远,唯有《韩非子》中的《解老》一句见于今本《老子》。由此,许地山先生得出判断:今本是后改的本子,不是原本。根据前人的征引判断《老子》的原本如何,这虽然还不能充分说明问题^①,但却表现了许地山先生对历史文献的高度重视。

其次,许地山先生以比较多的篇幅稽考道教前史的思想脉络,对道家学派的许多影响较大的经典进行思想内容的分析。无论是先秦时期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献,还是秦汉时期具有新道家倾向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许地山先生都注重发掘其深邃的思想内涵。例如对于全性派的庄学,许地山先生除了辨析庄周本人的齐物论、逍遥说之外,还从学派流衍的角度阐述庄周之后道家不同分支对全性精神的理解与发挥,通过仔细查考、对照,认为现存《庄子》中的《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四篇在思想上与稷下法治派道家具有密切关系;再如庄学与儒家的关系问题,许地山先生则从《庄子》中的一些篇章对“仁义”的态度入手,进行比较与辨析,以凸显庄周后学在政治社会中的立场。这表明许地山先生很善于进行思想追踪。

复次,从民俗社会学的角度对道教法术来源进行深入探讨。自古以来,宗教礼仪与民俗活动存在着诸多相互交错的层面,中国传统宗教也是如此。许地山先生为了彰显道教符咒法术的悠久历史,从当时所能感受到的社会习俗入手,以追踪远古巫术的源头。他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考察“巫”的社会职能,诠释其民俗社会学的内涵,诸如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星占等,由此伸展开来,进一步考察了“桃符”禳解驱煞之类杂术。他指出,“巫觋道与方术预备了道教底实行方面,老庄学预备了道教底思想根据。到三张、二葛出世,道教便建立成为具体底宗教”。由此可知,许地山先生是从思想与行动两

^① 古人引述言论常常是“意引”,这种“意引”有时候会改变表述方式,所以从古人引述来证明《道德经》原本面貌,不是完全可靠的路径。



个层次来考察道教文化渊源的，其论述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

第三，提出了道教史论说的诸多范畴和一系列颇具启迪意义的论题，为后来的道教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任何一种学科的建立都必须有自己独特的范畴概念，道教史也不例外。许地山的《道教史》之所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就在于它是以一系列概念范畴为其论说的网上纽结，作者善于从历史上关于道家的诸多论述中选择具有基础意义的概念范畴，并且进行深入稽考和解读。例如“道”、“阴阳”、“五行”、“虚静”、“全性”、“性命”、“无为”、“养生”、“长生”等等，这些概念范畴是道家典籍中经常出现的，它们的意义如何，这是需要重新解释才能明白的，许地山在《道教史》中一方面征引各种文献，以表明这些概念范畴在道家与道教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则通过语义的稽考，以发明概念范畴的内涵。

由于谙熟中国传统的经典文献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许地山先生的论说体现出许多闪光点。例如他在第一章探讨“道”的意义时指出，道家与儒家所讲的“道”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所注重的是“阴阳柔刚之道”，后者是“仁义之道”。这个说法可以说是抓住了儒道两家的思想要领。许地山先生概括道家思想，将“柔刚”置于“阴阳”之后，他不用“刚柔”，而用“柔刚”，其措辞是值得我们揣摩的。以“柔”置于“刚”前，这不仅是考虑到与“阴阳”概念相对应，而且是为了准确地表述道家的核心精神。道家哲学是一种“主阴”的哲学，这种哲学导源于《归藏》先坤后乾的卦序排列，到了《老子》而获得了明确的表达。《老子》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①显而易见，这是把“阴”放在“阳”前，体现了道家以“阴”为本的理念。基于这种理念，道家更倡导“以柔克刚”，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人生哲学。许地山先生对此颇有领悟，因此将

① 王弼：《老子注》第42章，《诸子集成》第3册第26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



“阴阳”与“柔刚”相续，以强调其思想主张的特质。

再如分析《老子》人生论的时候，许地山先生言及该书的历史哲学是“尚古主义”，它的生活方术便“立在这基础上头”，由此伸展开去，许地山先生将《老子》的生活方术概括为“修己”与“治人”两个方面。这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以往许多人常常以为老庄道家是消极、不理世事的，而许地山先生不仅看到了《老子》书中有许多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讨论，而且予以深入地剖析。许地山先生虽然不赞同《老子》的“无为”主张，但他以简练的言辞来概括《老子》的思想，却也是独具匠心的。他的许多论述对于后人的治学很有启发。

四、许地山《道教史》的历史局限性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也有许多局限性，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笼统地将道教说成是“迷信”。按照许地山先生在《绪说》中的描述，中国历史发展到唐宋时期，道教势力非常强大，以至于压倒儒家与佛教。由此，他更断定道家思想是国民思想的中心，这种看法是有历史与社会根据的。不过，在具体展开论述的时候，许地山先生却又多次给道教戴上“迷信”的帽子。例如他在《绪说》的最后一段以总结的语气描述：“总而言之，古初的道家是讲道理，后来的道教是讲迷信。”他的这种思想贯穿到斋醮科仪、符咒法术、炼丹服食等许多具体论述之中。我以为，这种看法是欠妥的。

“迷信”这个词最初是基督教、佛教对异教信仰的称呼。基督教把上帝以外的其他信仰称作“迷信”，佛教则用“迷信”指代不信佛教或信奉其他教者。这本是基于叛教的立场而使用的一个术语；可是在近代，“迷信”逐渐失去了原先关于较广泛的思想系统与信仰组成部分的内涵，而成为整体上杂乱无序的、充满落后与荒诞性的贬义词。民国开始，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迷信”更